日常生活与国民塑造

——以通俗教育研究会 1924 年“申禁二生”为考察中心

周慧梅

摘 要: 北洋政府时期,作为舶来品的电影在中国生根发芽,并迅速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中的休闲娱乐方式,对观众产生了广泛、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建立全国范围的电影检查制度。在此背景下,通俗教育研究会通过“申禁二生”(“二生”指《阎瑞生》《张欣生》两部影片),高调介入电影检查,并逐渐树立威权。该会作为教育部直属机构,与内务部争夺电影审查话语权的背后,不仅借助社会舆论广而告之社会教育司的职掌领域,并以此作为文化符码,彰显北洋政府借助“高台教化”传统对民众日常生活施加影响、进行现代国家塑造的内在理路,体现出蕴涵其中的国家权力。这一过程,挑战了以往学界对北洋政府“弱中央、强地方”的惯性评价。

关键词: 通俗教育研究会;权力争夺;威权树立;电影检查权
中图分类号: J9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9142(2018)03 - 0165 - 07

近代中国,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以影像直观、形象、真实,给国人带来前所未有的视觉冲击。“自电影进入中国并开始商业性放映之后,其放映规模和社会影响不断扩大,至 1920 年代中期,电影放映已在中国各大城市蔚然普及并向中小城市扩展,看电影已成为市民百姓最喜好的日常生活文化消费活动之一。”①“大多数(人)都成了一种新嗜好,要在每月的支款簿上,增加一笔(看电影)的开支了。”② 电影成为一种日常生活,“剧场之内,银幕之前,在每一个国度里,每天都有许多人在那里被它感动:或是激昂,或是叹息,或是欢笑,或是低回。而其结果却毫不客气地影响到各人的生活态度和行为上去。

收稿日期:2017 - 11 - 20
作者简介:周慧梅,女,河南延津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教育学博士。(北京 100875)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JYB006)。

① 汪朝光:《影艺的政治:民国电影检查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7 页。

② K. K:《舶来影片一页史》,《影戏生活》1931 年第 13 期,第 22 页。

这是现代社会里一支奇异的势力”，[①]对观众产生广泛、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引起社会各界各种效应的评判。众说纷纭中，电影检查成为教育界、电影界乃至社会各界聚焦的问题，并逐渐上升到国家高度。“审查情节，所以维持国家底体面和社会底风化；审查成绩，所以鼓励摄片者底谨慎和保全电影界底信用。”[②]由此，民众日常娱乐与国家体面、社会风化紧密相连，电影检查进入公共舆论和国家政策的场域。谁来负责检查、以什么标准进行、检查结果如何落实等问题，成为各界争夺电影检查话语权的核心内容。学界对于民国时期电影检查的研究，或侧重于制度沿革、地方教育界对电影检查的举措（汪朝光，2001、2013），或侧重民族国家意识与电影传播命运（李道新，2013），或侧重电影检查背后的权力制衡（钟瑾，2010、2012），或北洋政府时期的电影检查格局（王瑞光，2014）等，并无专文就教育部借通俗教育研究会介入并逐渐主导电影检查权展开讨论。有鉴于此，本文以通俗教育研究会1924年“申禁二生”（“二生”指《阎瑞生》《张欣生》两部影片）为中心，探讨通俗教育研究会介入电影检查的轨迹、动因，揭示北洋政府教育部检查电影“以禁邪恶，而维风教”的价值取向及电影检查实际运作中的复杂机理，进一步加深对通俗教育研究会的认知。

一

作为北洋时期教育部的直属机构，1915年成立的通俗教育研究会[③]承担着统筹全国社会教育的管理职能。该会成立之初，会长袁希涛（时任教育部次长）深感清末新政以来社会教育办理流弊，“只有章程有条例即谓责任已尽，更无办事之实例”，导致“其效验之薄弱，必百口同声而莫能为讳”，专门强调“今本会诸君，俱素抱热忱，务从实际进行，推而广之，必使社会日益改良，国力日益扩张”。[④] 从实践中推而广之，这种角色定位，使得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影响得以突破北京一隅，辐射全国范围。1923年之前，通俗教育研究会戏曲股负责“关于活动影片、幻灯影片、留声机之调查事项”，实际工作重点集中在审查小说、戏剧及演说词等方面[⑤]，并未涉及电影检查。1923年10月，该会注意到各埠电影“影响社会较戏剧为尤深，其中所映影片有裨世道人心者固多，而诲淫诲盗亦所难免”，专函京师警察厅转饬各电影场，要求其“仿戏园之例，将所演戏目先期呈送”，[⑥]由该会负责审查。尽管电影场对此应者寥寥，但丝毫未减通俗教育研究会介入电影检查的热情。经过数月酝酿，次年4月23日，通俗教育研究会上书教育部，称“近日调查，最近所演影片有为害最甚者二种：一为阎瑞生谋害莲英案，一为张欣生谋产案”，请求申禁二片。申禁理由如下：

> 二案虽系近年上海实事，然其人则流氓贼子，其事则残害杀伤，不知制造影片者何所取意，而必取此种材料，演诸广场，以淆惑心理简单之人民，智识粗具之学子。喜其新奇，争先快睹，使此等残忍惨酷之状日接于目中，于人心播为风俗，其贻害于社会教育实非浅鲜。本会为防止流弊起见，拟恳咨行内务部通令所属一律严禁。再，查此项影片系在上海租界制造，并请转咨江苏省长转饬驻沪交涉员请领事团查取此项影片，即行销毁，以禁邪恶，而维风教。

在呈文中，通俗教育研究会立足道德教化和民族主义情感，措辞激烈，视二影片“为害最甚”，呈文

① 孙师毅：《对于省教育会的电影审查说话》，《银星》1926年第2期，第8页。

② 凤昔醉：《影片审查制度》，见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无声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页。

③ 在学界已有成果中，对通俗教育研究会研究有三种定位：官方的全国性管理机构（沈鹏年，1963；汪朝光，2000；王瑞光，2009）、半官方的学术团体（万妮娜，2009）和兼具管理、教育和文化风气指导的中央机构（刘嘉恒，2013）。笔者认为其经费、人员构成及事业核心均由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主导，将其定位于全国性的社会教育管理机构。

④ 袁希涛：《本会讲演》，见通俗教育研究会编：《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一次报告》，1915年。

⑤ 《通俗教育会禁止售卖不良小说》，J128-3-04479（全宗号-案卷号-目录号），天津市档案馆藏。

⑥ 《通俗教育研究会为禁止上演不良影剧呈并教育部批令》，见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76页。

要求内务部严禁影片放映，并“请领事团查取此项影片，即行销毁”。[①] 这篇檄文中，“禁邪恶，维风教”成为了旗帜。那么，《阎瑞生》《张欣生》到底是怎样的电影？其班底及社会评价如何？

《阎瑞生》由中国影戏研究社联合商务印书馆活动摄影部出品，根据上海“阎瑞生案”[②]实事改编。为追求逼真和现场感，影片中妓院、赛马场、大世界娱乐场、汽车兜风、荒郊夜幕、徐州火车站、检查厅、龙华护军使者、刑场等，均是实景拍摄，字幕说明采用白话文。作为第一部国产故事长片（100 分钟），在真人真事、实地实景的号召下，这部“中国人自摄的影片，真正的不可不看”，[③]上映后产生轰动效应。在票房上取得极大成功：1921 年 7 月 1 日在法租界夏令佩克影戏院首映，当日“竟达 1300 余元”[④]；“开映一周，该片票房即达 6683 元”[⑤]；观众“要求续映者亦颇不少”[⑥]。获得高票房的同时，社会舆论却不佳：“在彼固以为揭发社会黑幕，使人警惕其中，实则迎合社会弱点，未见其警惕，反得其凶淫，何善之有”；“这类半写妓家猥亵的琐闻，半写强盗杀人的写真，惟有诲淫诲盗四个大字足以当之”[⑦]。有识之士呼吁政府出台电影检查规则，以防流弊。

《张欣生》同样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是沪上 1921 年最为轰动的“逆伦血案”[⑧]。有研究者考证，见《阎瑞生》票房火爆，上海最有实力的电影公司明星公司总经理兼导演张石川请郑正秋作编剧，推出刑侦大片《张欣生》，全片“俱就实地取景，及演员之面相，亦必使与本人相似，而表演之真实，剪接之合度，尤为是剧特色”。影片高潮在开棺验尸一幕：湿面粉加墨水制作出死者五脏六腑，在特写镜头下解剖出来，不少观众看到一半就受惊离场。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到上海出差，见《张欣生》热映前往观看，看到开膛这一段，愤然掩口离席。[⑨] 但教育总长的愤怒阻挡不了影片票房大卖，上海租界“片到而客场满”，如恩派亚影剧院放映时“立而观者若干人，人群中几无隙地”；卡德路影戏院放映时，因“连日售座异常拥挤”而临时决定加映次数。[⑩] 截止 1922 年 3 月 5 日，票房累计达 6682.5 元。继而在全国巡映，在天津一地影片上映三天就获得 2000 余元的票房。[⑪]《张欣生》与《阎瑞生》一样，票房大卖，口碑不佳。

二

很有意思的是，在通俗教育研究会给出“严禁”评价之前，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江苏省教育

① 《通俗教育研究会为禁止上演不良影剧呈并教育部批令》，见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76－177 页。

② 1920 年 6 月，上海发生一桩谋财害命案，凶手是洋行白领阎瑞生，毕业于震旦大学，吃喝嫖赌背上巨债，见妓女王莲英腰缠万贯，心生歹意，遂以坐轿车兜风为由，将其骗往郊外勒死，劫走财物合 3000 块大洋，后被缉拿归案，公审后枪决，案件轰动一时。大学生堕落，名妓惨死，千里追捕，此案集合众多吸引眼球的元素，马上被改编成小说、文明戏，成为妇孺皆知的热门话题。

③ 《阎瑞生电影广告》，《申报》1921 年 7 月 1 日。

④ 潘国美：《中国电影史》，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8 页。

⑤ 《请禁止电影〈阎瑞生〉〈张欣生〉影片议案》，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 1057－553。

⑥ 《〈阎瑞生〉片映于中国大戏院》，《申报》1924 年 5 月 20 日。

⑦ 醉星生：《中国无声电影》，见《上海电影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316－1317 页。

⑧ 张欣生是上海浦东三林塘“张万兴米店”老板张驾云的长子，吃喝嫖赌、抽鸦片，其父为防多年经营的万贯家财被败光，对其实行严格的经济控制。张欣生在外债台高筑，苦闷不已，狐朋狗友朱潮生为其出招，介绍江湖郎中朱健臣，定下弑父计划，借父亲生病之机将其毒死，买通阴阳生，以病死入殓，张欣生顺利接管家业，后因与朱潮生、朱健臣起内讧，被朱潮生告发。1921 年 3 月 18 日，上海检察厅在普益习艺所草地上用竹篱围出一块场地，作为审讯场所，讯供、起棺、验尸等在露天环境下公开举行，全程耗时三天，张欣生、朱健臣、朱潮生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围观民众人山人海，轰动一时。

⑨ 李响：《民国禁片给电影公司赚大钱：剪刀与电影共同成长》，《国家人文历史》2013 年第 2 期，第 5－6 页。

⑩ 《张欣生影戏增加演映次数》，《申报》1923 年 3 月 3 日。

⑪ 王瑞光：《论通俗教育研究会的电影审查活动》，《兰台世界》2014 年第 1 期，第 57 页。

会电影审阅委员会曾先后对《张欣生》给出意见，前者认为“均无错处”[①]，后者给出“无流弊”“尚无不合”，[②]与通俗教育研究会“申禁”态度大相径庭。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负责影片审查与影院执照发放，采取映后检查方式，影片多为美国电影，《阎瑞生》《张欣生》是为数不多的中国影片，检查起因是中国地方政府交涉。1923 年 5 月 28 日，江苏特派交涉员许沅遵照江苏省政府指令[③]，照会上海外国领事机构，要求查处并销毁《阎瑞生》《张欣生》两部电影，以防“危害社会”。7 月 9 日，意大利领事馆总领事向工部局转达江苏省政府交涉意见，工部局据此转饬警务处负责调查审核。7 月 30 日，警务处处长呈文代理总办，称从其观点看“两片均无错处”[④]。江苏省政府“查处并销毁”外交交涉要求以失败告终。

江苏省教育会电影审阅委员会 1923 年 6 月 15 日在上海成立，“推定审查影片委员，专事审查各种中国影片之良窳”[⑤]，审阅委员会以江苏省前民政司司长沈信卿为主席，贾季英、毕静谦等 10 位教育专家、社会名流为成员，特殊的身份赋予该会较多的威信，提高电影检查的社会认知度。7 月 2 日，明星公司将包括《张欣生》《顽童》《劳工之爱情》和《滑稽大王》的四部影片送呈，成为第一批被检查电影，比照检查标准，该会对《张欣生》作如下评语：“全片十二幕，均系演明事实，且属果报之意，尚无不合。惟以烟赌造成罪恶之原因尚少说明，应于三犯执行死刑时，插入忏悔语以表明之。如照改后，亦适合本会所定标准第二条。”[⑥]评价肯定影片价值取向，对部分内容指出修改，颠覆了江苏教育会早前“查处并销毁”的评语。有研究者据此指出该委员会有很大程度的独立审阅电影话语权，是地方精英借助电影检查与官方分享权力，“江苏电影审阅会独享电影检查权的做法看起来似乎与他们强烈的政治渴望之间存在着某种一致”[⑦]。实际上，这种宽容态度与其说是独立话语权，倒不如说是一种识时务、人情练达的策略。其时，上海租界汇集几乎全部的国产电影公司，大量外国电影由此登陆中国，是国内最大电影生产和放映市场，电影审阅委员会作为江苏省教育会“自谋进行事业”的民间团体，仅有“请官厅干涉”具文，却无行政执法权力，面对“有的公司敷衍面子送请审阅，有的公司置诸不理”[⑧]的局面，如欲使电影检查工作有所进展，必须熟稔夹缝中谋生的规则，影片公司、租界工部局的态度都不得不予以考虑。

尽管有上海租界工部局、江苏省教育会电影审阅委员会对“二生”的检查结论，通俗教育研究会仍然向教育部提交“严禁”呈文。尽管明知江苏省政府通过特派交涉员与上海公共租界交涉无果，通俗教育研究会却再次“并请转咨江苏省长转饬驻沪交涉员请领事团查取此项影片，即行销毁”。[⑨] 究其原因，通俗教育研究会之所以重振旗鼓，以“禁邪恶，维风教”道德教化为出发点，显然意在彰显其介入电影检查的官方立场。军阀割据的社会状态，加上租界林立，导致出现中央政府不稳定与民间社会思想极端活跃的情形，学界多以“弱中央，强地方”来概称，这种状态亦延伸到社会教育话语权的争夺方面。实际

---

① 《警务处处长给代理总办的调查报告》，《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处关于影片审查事 卷一》，U1 - 3 - 2401，上海市档案馆藏。

② 《〈张欣生〉影片映演之经过》，《申报》1923 年 7 月 8 日。

③ 江苏省政府先后接到上海总商会呈文（1923 年 3 月 18 日，上海总商会致电江苏省省长公署称：“近年以来，沪上此类营业日益加繁，而人民嗜此者亦日众，果能将影片分类，严加选择，去劣留良，则人民于淑性陶情之中，可兼收易俗移风之效”；详见《总商会电请取缔影片》，《新闻报》1923 年 3 月 18 日）、江苏省教育会呈文（4 月 8 日，江苏教育会呈文以“近年国内渐已自制影片，倘取材不慎，弊害尤多，即如阎瑞生、张欣生一案，皆已扮摄表演，此等影片皆取社会罕见之惨恶状况摄影流行，实不能收欣赏感化之效果，本此一推，对于制造影片一事，苟非加以取缔，亦将为导恶源泉。为敢呈请鉴核，并案办理，以维风化，社会幸甚，教育兴甚”），江苏省政府据此做出外交交涉的决定。详见《取缔有碍风化影片之呈请》，《新闻报》1923 年 4 月 8 日。

④ 《警务处处长给代理总办的调查报告》，《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处关于影片审查事 卷一》，U1 - 3 - 2401，上海市档案馆藏。

⑤ 《省教育会今日开影片审查会议》，《申报》1923 年 6 月 15 日。

⑥ 《省教育会审阅明星片之评语》，《申报》1923 年 7 月 5 日。

⑦ 钟瑾：《迷失在权力的漩涡——民国电影检查研究》，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年，第 18 页。

⑧ 孙师毅：《对于省教育会的电影审查说话》，《银星》1926 年第 2 期，第 8 - 9 页。

⑨ 《通俗教育研究会为禁止上演不良影剧呈并教育部批令》，见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76 页。

上，以通俗教育研究会为代表的中央从来没有放弃对社会教育阵地的争夺，其中，争夺电影审查权便是突出表现。

电影进入中国以来，国人对道德题材特别关注，随着故事片逐渐成为电影主流，“盖小说非略识之无，粗通文理，不足玩索个中之滋味，而影片则显著之状态，村娃乡农，一见即知，无烦索解。制片者为贸利起见，往往刷印此项影片，迎合社会心理，以冀营业之发达，不知秽情艳态，易导人以桑濮之行，冥冥中隳坏名节不少”；[①]“能感化人之性情，刺激人之精神，改化一地风俗，助文化进步之影片，竟如凤毛麟角”。[②] 美国侦探片的大量流行，更让国人担心不已，“自侦探长片输入而后，国内之盗劫偷窃之数，遂与此等影剧之流行同增，且其所用之方术，亦即本影剧上传来之西方方法”，“侦探长片实有百害而无一利”。阎瑞生被捕后，“在审讯时，供认谋杀情况，都从美国侦探片看来的，案件的本身，的确就是一部外国侦探片的翻版”[③]。这更加深了欧美等国“不良”电影易于误导观众的看法。电影不再仅仅是个人娱乐的日常，而是攸关社会治安、民族国家的大事，通俗教育研究会以官方身份，矛头直指“影响大但口碑差”的侦探故事片“二生”，藉此介入电影检查，较易赢得社会各界的认同。

没有资料证明“申禁”影片的后续进展，但通俗教育研究会却因此获得足够关注。1926 年 2 月 18 日，该会戏曲股增设电影审查会，呈请教育总长公文称“窃查影剧一事，于社会教育关系綦重，其良者固足转移风俗，裨益社会，而稍涉偏激，亦易滋流弊，不可不详加审核，分别奖禁”。该会拟定《审查影剧章程》第一条“凡编演影剧，不论该剧片系在本国制造或外国输入者，均须经本会审定后方准映演”，章程中不仅厘定褒奖、剪截或修改以及禁止的详细标准，并规定“凡经本会审查之影剧，应于本会丛刊或教育公报中随时公布之”。[④]11 月，该章程修订后以教育部名义颁布。“此章程对检查标准的规定，是民国电影检查制度初创过程中最为详尽的一次，不仅有各地检查标准中均有的关于‘治安’、‘淫亵’、‘风化’、‘风俗’等等的禁令，而且第一次列入了关于‘辱华’和‘有碍外交’的内容，从而使电影检查在道德关怀外，有了一定的意识形态或政治意味，反映出与江浙地方电检会标准的差别。”[⑤]显而易见，通俗教育研究会订定《审查影剧章程》，是以国家机关自居、以“中央”姿态来布展全国电影检查事业，并由此确立电影审查的法理地位。1927 年 12 月底，通俗教育研究会依照章程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电影审查，以“营业好”且影响较大的中天、中央、明星、青年会等八大影剧院为对象，审定影片 113 部[⑥]。通过这次审查活动，通俗教育研究会在电影审查格局中日渐占据主导地位，成为理所当然的电影审查的权威机构。通俗教育研究会作为教育部直属机构，代表北洋政府教育部的主张和设想，是中央权力向基层的渗透，而非地方自治及地方精英在教育领域的权力扩张。

不难看出，通俗教育研究会呈文申禁“二生”，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通俗教育研究会要介入电影审查，必须借助大的事件或影响大的影片来实现，“二生”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这两部影片已放映一段时间（电影公司已获得足够的经济回报），社会影响大，且上映后社会上一直存在不同声音，“严禁”呼声不绝于耳。通俗教育研究会通过公开申禁两片，既不会遭遇电影公司的激烈反应，又足以吸引人们的眼球，由此向社会表明其介入影片检查的态度。这次申禁，与其说对两者的票房施加影响，倒不如说是通俗教育研究会借这件事来营造舆论，更多的是向社会、世人传递一种姿态而已，策略意义

① 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无声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25 - 526 页。

② 罗树森：《余希望于中国电影界者》，《申报》1925 年 10 月 27 日。

③ 《令取缔不良电影》，《大公报》1921 年 11 月 1 日。

④ 《教育部关于审查影剧章程实行事致通俗教育研究会指令》，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77 页。

⑤ 汪朝光：《影艺的政治：民国电影检查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9 页。

⑥ 审核的 113 部次电影中，有 109 部获得了审核通过并“发讫审定证”，其中 104 部为直接发放，5 部虽发送但要求修改、剪截后才能上映，审核未通过的影片有 4 部。审核基本以个人为单位进行。为了避免个人审核的主观性，通俗教育研究会对一些有争议的电影采取复审制度。从审核结果及评语来看，通俗教育研究会核心标准在于是否“有伤风化”，接吻、勾脚、诲淫内容是审查重点，延续了 1924 年“申禁二生”时“以禁邪恶，而维风化”的价值取向。详见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审核电影片一览表》，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 1057 - 552。

远远大于实际效果。

三

教育部借助通俗教育研究会，逐渐掌控北洋政府电影检查权的现实，却引发内务部强烈不满。晚清民政部“民风整饬”、“地方安靖”的定位，被北洋政府时期内务部所延续，其下设警政司统辖全国警察事业，警察厅负责检查影剧院治安，使得内政部对于全国电影检查有实际掌控权。1924 年 1 月，内务部曾发出通令，宣称“内部有维持风化，规定人心之责，对于奸盗淫邪之剧片，亟应严加取缔，以端风化，而维社会治安秩序。……凡各园新到之片，须经官厅检阅许可后，方准开演”。[①] 通俗教育研究会“申禁二生”时“拟恳咨行内务部通令所属一律严禁”[②]即为明证。但时移世易，内务部面对教育部一连串先声夺人、拔城掠寨的强劲势头，倍感压力，不得不提枪应战，加入电影检查话语权的争夺大战之中。

1928 年 2 月 13 日，内务部以本土传统和国际惯例[③]为依据，向国务院提出设立电影检查委员会，并递交《电影检查规则》《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组织规则》，规则中对影片内容、检阅机构、检阅人、检阅有效期、检阅收费标准以及电影放映场所临时检查做出新规定，并以内务部职员为核心组织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旨在剥夺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审定权。面对有备而来的内务部，教育部沉着应战，对其《电影检查规则》的收费标准率先发难：“其最要者系按影片大小为收费之标准，与推行社会教育宗旨不符，提请内(务)部修改”[④]。其时“电影为改良社会之利器”已为舆论广泛认可，内务部以影片大小而罔视影片内容来收费，显然是背时代而行，面对教育部一针见血的指责，内务部唯有虚晃一枪，转而对通俗教育研究会“视影片中接吻戏为淫亵”提出异议，认为“过于泛化”[⑤]。

教育部作为管理教育事务的中央行政机构，下设普通、高等和社会教育司，社会教育司职掌范围包括文艺、音乐、演剧等，电影作为演剧的一种，自然被纳入管辖范围之内。与内务部最大的区别是教育部直属机构通俗教育研究会承担直接的电影检查工作，教育部在行使审批职能的同时，实际上行使着直接的电影检查工作。1926 年 2 月 18 日，通俗教育研究会“拟定审核影剧章程十条”，教育总长易培基给予“核阅所拟章程各条，均称妥协，应准照办”的指令。[⑥] 从呈文与指令的高度契合来看，两者实际上“一而二，二而一”。而通俗教育研究会戏曲股主任来自京师警察厅，会员及荣誉会员的背后实力，保障了该会制定的规程、决议的切实可行性。实际上，教育作为现代国家权力之一，是塑造国民、民族国家认同、政治认同的重要一环，而社会教育作为这一环上最独特的存在，成为国家迈入现代化的指标。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用“知识——权力”共生结构将教育与国家权力联系起来。在他看来，权力不仅驻足于国家机关层面，还通过技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检查作为一种技术，教育部“借助于它不是发出表示自己权势的符号，不是把自己的标志强加于对象，而是在一种使对象客体化的机制中控制他们。在这种支配空间中，权力主要是通过整理编排对象来显示自己的权势”。[⑦] 电影作为一种技术的文化符码，被赋予“裨益社会”“转移风俗”的教育功能，教育界在电影检查舆论声中地位日渐凸显。电影公司

---

① 《内政部取缔不良影片》，《益世报》1924 年 1 月 16 日。

② 《通俗教育研究会为禁止上演不良影剧呈并教育部批令》，见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76 页。

③ 内政部对日本、法国、美国、荷兰、丹麦等资本主义国家电影检查制度和组织进行了一系列考察，从中寻求支撑其职掌电影检查的域外经验。内务部拟定《电影检查规则》和《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组织规则》，便是以日本 1925 年内务部颁布《活动电影片检阅规则》为蓝图。详见钟瑾：《民国电影检查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4－55 页。

④ 《内教两部对检查电影片规则》，《晨报》1928 年 2 月 15 日。

⑤ 《检查电影不禁接吻》，《晨报》1928 年 2 月 18 日。

⑥ 《通俗教育研究会为禁止上演不良影剧呈并教育部批令》，见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77 页。

⑦ ［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修订译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2 年版，第 211 页。

亦非常娴熟这个“高台教化”桥段，比如备受舆论谴责的明星公司，论及拍摄《张欣生》的初衷，显然是“注意于遗产制度、家庭教育、社会环境三大端，使观者知欣生弒父之原因，而引起改革社会之意”。[①] 加上江浙等地教育会下设电影审查委员会及“教育救国”思潮风起云涌，均为通俗教育研究会争取电影检查权营造了舆论，增加了教育部与内务部争夺的底气。

果不其然，国务会议阁议驳回内务部的请求。国务院特专函教育部，称“电影本内（务）部行政事项，贵部既经设会研究，亦应参加讨论”，婉转承认通俗教育研究会电影检查权威的既定事实。1928 年 2 月 17 日，两部分别派职员共同审核内务部制定的电影规则，达成了“降低检查费用、取消对影片中接吻的禁令”共识，并就委员会组织问题“设主任二人，委员十六人”、“双方各占一半”达成一致。[②] 4 月 10 日，内务部、教育部联合呈文国务院，称“现在我国舶来影片既随处任意演映，而自制影片公司近来亦纷纷成立，所有编演各剧，是否足以奖善劝恶，不致引导奸邪，实属有益人心风俗，影响地方治安，自应亟速厘订妥善方法，切实检查，并为订定儿童准看与否之标准，不足以正人心而宁社会”，两部共同拟定《电影检查规则》呈交国务院。国务院批准设立两部委员各半的中央检查电影委员会，并于次日颁布《检查电影暂行规程》暨《中央检查电影委员会组织规则》。[③] 以此为标志，由教育部、内务部联合组成的中央检查电影委员会正式接替通俗教育研究会，成为北洋政府审查电影的官方电影审查机构。该委员会成立后，宣布取消各地电影检查权，努力架构中央——地方两级检查体制。此时北洋政府统治已摇摇欲坠，北京当局忙着与南方政府进行拉锯式谈判，其电影规则已无实际执行的可能，但该规则中专门强调“儿童准看标准”，“为国家未来希望计”，北洋政府通过“儿童”这一特定群体，将电影检查同国家民族的未来联系起来，在道德层面上增添额外的价值判断，为其后国民党电影检查介入民众日常生活提供了路径。

综之，无论通俗教育研究会高调介入电影检查并逐步取得权威地位，抑或内务部奋力反击，以及两部在国务院调和下“联袂主持”中央检查电影委员会，其背后所倚重的均为北洋政府的政治威权。1928 年 4 月，内务部、教育部联合颁布《检查电影暂行规则》，第一条规定：“本国自制电影片及外国电影片之来华演映者，均应依照本规则送内、教两部合组之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检阅，在未经检阅前不得演映”，[④]凡该会认为“与公安、风俗、道德、教育及邦交上并无妨碍”影片，可予通过，凡有妨碍者，得予以“删改、剪截或发还重制”；于社会有良好影响者，得由会中酌给奖励，如电影公司、电影院有违犯本规则规定者，应停止放映，并酌量处罚。这样的表述，彰显了北洋政府作为“中央”电影检查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奠定了之后数十年电影检查的行政格局。北洋政府试图通过自身权力机构，于顶层设计中规划全国范围内的电影检查政策，对民众日常生活进行规训，从而达到国民塑造、国家认同。北洋政府的电影检查规则，意识形态与道德关怀并重，开启国家权力与民众日常生活之间的博弈，并内化到权力合法化和建设国家的现实需要之中。无论通俗教育研究会电影审阅会，抑或之后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给予褒奖、剪截、修改及禁止的裁决，都表明北洋政府通过审查电影对民众日常生活施加影响、进行现代国民塑造的内在理路，体现出蕴涵其中的国家权力。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受北洋政府实际控制范围的政治格局影响，以及政府执行以道德为主电影检查的内在缺陷，使得影响层域、程度都大打折扣，与制度设计中的效果相去甚远。

（责任编辑：子聿）

① 《省教育会审阅影片》，《申报》1923 年 7 月 3 日。
② 《检查电影不禁接吻》，《晨报》1928 年 2 月 18 日。
③ 《检查电影规则公布》，《益世报》1928 年 4 月 12 日。
④ 《内务部会拟检查电影及其组织规则（附日本官所检查影片规则）》，1001 - 2 - 0736，第二历史档案馆藏。